

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

刘杨¹, 陈舒洁¹, 林丹华²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北京 100191;

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考察系统家庭环境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应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北京、广州、福州三地的 386 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测查。结果:①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②新生代农民工系统家庭环境可划分为良好家庭环境和不良家庭环境两种类型。③系统家庭环境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发挥调节作用,其中良好家庭环境组中歧视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的绝对值为($|\beta|=0.03, P=0.68$);不良家庭环境组中歧视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的绝对值为($|\beta|=0.44, P<0.001$)。结论: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消解歧视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歧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家庭环境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5-0807-04

Discrimin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Moderating of Family Environment

LIU Yang, CHEN Shu-jie, LIN Dan-hua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School,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Methods:** A sample of 386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①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ho ha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presented bette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an those who had lower education degree. ②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amily environment could be separated into two types: one was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including 142 samples (36.8%); the other one was poor family environment, including 202 samples (52.3%). ③Family environment had a moderate effect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In the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group the predicted effect of discrimination on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was 0.03, while in the poor family environment group, it was 0.44. **Conclusion:**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can reliev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Key words】 Discriminati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Family environment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 1980 年以后的农民工,亦称第二代农民工^[1]。全国总工会 2010 年 6 月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 1 亿人左右,在农民工群体中占据六成的比率,约为我国在城职工人数的一半^[2]。相关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许多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预期会更高,但由于年龄较小及缺少农村生活体验等原因,他们的心理承受和抗压能力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更易出现身份认同感、自卑、孤独等心理问题^[3,4]。相关研究亦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同年龄阶段的城市青年^[5]。这些状况表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开展研究,探讨该群体特有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机

制,对了解当今社会背景下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促进城市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量研究表明,歧视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观幸福感^[6],提高他们的抑郁严重程度^[7]。然而,歧视领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歧视还会通过许多中间变量作用于个体心理健康,这些中间变量会调节或中介歧视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8]。如 Yip 以 2047 名亚裔美国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种族身份感是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发挥调节作用的中间变量,在 41-50 岁的被试中,种族身份感会缓冲歧视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在 31-40 岁的被试中,种族身份感会加剧歧视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9]。故此,探索并分析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间发挥作用的中间变量,有助于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性的研究依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CSH028);工信部基本科研业务费(30420110825)

通讯作者:林丹华

“家庭环境”是指一个家庭的总体氛围,它能反映出—个家庭中各个成员的互动关系及家庭生活的特征^[10]。“家庭亲密度”、“家庭情感表达”、“家庭冲突”是评价家庭环境的关键性指标^[11]。“高家庭亲密度、高家庭情感表达、低家庭冲突”代表良好的家庭环境,“低家庭亲密度、低情感表达、高家庭冲突”则代表不良的家庭环境^[10]。“家庭环境”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如饶燕婷的研究^[12]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降低大学生的疏离感和抑郁程度,家庭环境除了对心理健康发挥主效应外,它还发挥调节效应。如 Linda 以 181 名华裔美国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家庭冲突性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发挥调节作用,其中高家庭冲突会增强歧视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高家庭亲密性可以降低歧视对焦虑情绪的预测作用^[13]。

尽管现有研究已探讨了家庭环境在歧视与个体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机制,但还存在一些不足:①尚未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相关研究。一些研究表明,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14],来到城市之后,尽管远离原有的家庭系统,但家庭依旧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一种最为重要的、无可替代的社会支持系统。例如周林波的研究表明,配偶,父母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心理压力时最重要的情感支持来源,父母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物质生活压力时首选的经济支持来源^[15]。同时,和它的社会关系相比,家庭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感受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14]。那么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家庭环境是否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发挥调节作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才能更好地消解歧视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②仅探讨了单个维度的家庭情感环境在歧视与个体心理健康中的作用,如家庭亲密度、家庭冲突^[13]。但正如前文所述,家庭情感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它是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冲突性三个维度的集合体,只有对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考查,才能对家庭环境的效应做出准确和全面的说明。鉴于此,本研究将从整体的角度考察系统的家庭环境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在北京、广州、福州三地选取了 386 名出生于 1980 年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被试。其中:北

京 239 人(62%),福州 120 人(31.1%),广州 27 人(6.9%);男性 211 人(54.7%),女性 147 人(38.1%),性别信息缺失 28 人(7.3%);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3.31±4.26 岁。

1.2 工具

1.2.1 感知到的歧视问卷^[16] 采用 Harvey 编制的歧视量表(Stigmatization Scale)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状况进行测查,本研究结合前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结果对原问卷进行了修改。问卷列举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遭受到的 16 种歧视情况,通过询问被试所描述的句子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来测查其知觉到的歧视的情况。典型题目为“在北京我感觉低人一等”等。该问卷为 5 点计分,1 为“一点都不符合”,5 为“完全符合”。计时时将各题目相加求总分,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歧视越多。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 0.78。

1.2.2 家庭环境问卷^[17] 采用 Moss 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第三次修订版)中的家庭亲密度、家庭情感表达和家庭冲突三个维度的题目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情感环境状况进行测查。该量表共有 27 道题目,其中家庭密度维度有 9 道题,如“家人之间总是给予最大的帮助和支持”;家庭情感表达维度有 9 道题,如“家人们会公开表达相互之间的情感”;家庭冲突维度有 9 道题,如“家庭成员有时互相打架”。量表为 2 点计分,“1”为“否”,“2”为“是”,分数越高,代表家庭亲密度越高,家庭情感表达越好,家庭冲突越高。该量表中的三个维度在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 0.74、0.70 和 0.68。

1.2.3 Bradburn 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情感平衡量表^[18] 该量表共 10 道题,采用“是、否”的计分方式,“是”计 1 分,“否”计为 0 分。总分在 0~10 之间,分数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 0.69。

1.2.4 Radloff 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简化版^[19] 该量表共 10 道题,采用 4 点计分方式,1 为“从不和极少”,4 为“总是”。计时时将各题目相加求总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 0.79。

1.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一对一施测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主试均为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式施测前,由课题负责人对所有主试进行培训,对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具体施测时,由主试向被试讲解问卷填法并随

时回答被试填写中出现的问题。问卷施测后由主试当场核查问卷。每位被试在调查后均获礼品一份。

1.4 数据管理及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5.0, Amos9.0 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

采用 MANOVA 对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和抑郁状况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详见表 1):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显著($F=6.71, P<0.05$),具体来说,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初中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抑郁的主效应,性别、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抑郁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同时,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三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抑郁的二维、三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表 1 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幸福感、抑郁上的方差分析结果

	主观幸福感			抑郁		
	M	SD	F	M	SD	F
总体	1.52	0.02		2.09	0.06	
男	1.54	0.02	0.02	2.07	0.06	0.03
女	1.51	0.03		2.12	0.10	
初中及以下	1.48	0.04	6.71*	2.18	0.11	0.38
初中以上	1.57	0.13		2.06	0.03	
未婚	1.53	0.02	0.04	2.06	0.07	0.39
已婚	1.52	0.03		2.13	0.10	

注:* 代表 0.05 水平显著,** 代表 0.01 水平显著,*** 代表 0.001 水平显著,下同。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环境类型

	良好的家庭环境	不良的家庭环境	F
家庭亲密度	13.26	9.66	659.82***
家庭情感表达	13.61	11.90	124.81***
家庭冲突	13.33	15.93	252.85***
总人数	142(36.8%)	202(52.3%)	

注:家庭环境类型划分上缺失值为 42 人,占 10.9%。

2.2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环境类型

应用 K-means Cluster 对家庭环境的三个维度进行快速聚类,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环境划分为两个类型,良好的家庭环境(高家庭亲密度、高家庭情感表达、低家庭冲突)、不良的家庭环境(低家庭亲密度、低家庭情感表达、高家庭冲突)。结果表明(详见表 2)两个类型在家庭环境的三个维度上均存在着显著差异($F=659.82, P<0.001; F=124.81, P<0.001; F=252.85, P<0.001$)。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两个类型上的人数分布为:良好家庭环境为 142 人(占 36.8%);

不良家庭环境为 202 人(占 52.3%)。

2.3 家庭环境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依据多群组线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家庭环境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首先以歧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抑郁、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两种家庭环境类型为组变量设定参数有限制的(即两组中的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相等)结构方程模型。再以歧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抑郁、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两种家庭环境类型为组变量设定参数无限制的(即二组中的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不等)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详见表 3),相比起参数有限制的模型,参数无限制模型的卡方变化量为 5.41,自由度的变化量为 1,大于自由度为 1 时卡方的临界值 3.84(0.05 水平显著)。同时,参数无限制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chi^2/df=5.41, GFI=0.94, NFI=0.92, CFI=0.92, RMSEA=0.08$ 。可见,系统家庭环境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发挥调节的作用。

在参数无限制的结构方程模型中,良好家庭环境组中歧视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的绝对值为($|\beta|=0.03, P=0.68$);不良家庭环境组中歧视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的绝对值为($|\beta|=0.44, P<0.001$)。可见,相比于不良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情感环境有助于消解歧视对于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表 3 参数有限制,参数无限制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GFI	NFI	CFI	RMSEA
参数有限制	0	0	0	1	1	1	0
参数无限制	5.41	1	5.41	0.94	0.92	0.92	0.08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系统家庭环境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发挥调节作用。这个结果在一个新的群体中再次验证了家庭环境在歧视与个体心理健康中的调节作用,这拓展了该模型的适用对象及适用文化的范围,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个结果也深化了我们对家庭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的作用的认知。以往研究关于家庭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研究仅论述了家庭中某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如考察夫妻间的关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感和愉悦感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夫妻间吵架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愉悦感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14]。而本研究综合地从多个角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环境变量,在其基础上考察了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这让我们更清楚、全面地

认识到家庭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更有助于缓解歧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影响。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3]。其原因包括两点:首先,家庭环境会影响个体对压力的感知程度。有研究表明,具有高亲密度、高情感表达性的家庭,可以让个体在家庭中自由地表达和倾诉歧视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感受,通过相互支持降低歧视所带来的压力感^[20],而生活在低亲密度、低情感性家庭环境中的个体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故此良好的家庭环境更能消解歧视的消极影响。其次,家庭环境会对家庭成员自尊等心理特征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有效的提升家庭成员的自尊水平和成就感。如陈晓菁^[14]认为,良好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水平、成就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则会引发诸多心理问题,如刘素珍的研究^[10]表明,低家庭情感表达会引发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低家庭亲密度会引发大学生的疏离感。所以,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让个体拥有更好的应对歧视负面影响的个体特征,从而消解歧视的负面影响,起到保护心理健康的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亦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干预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以往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过于狭窄,对血缘、地缘的支持过于依赖,干预重点应放在增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如社区和政府的支持^[21]。国外移民群体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于文化融入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来自移民国的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文化的融入,而来自于移民群体内部的支持可以有效地增强心理适应^[22]。本研究对于家庭环境作用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干预时,在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同时,也要加强家庭环境的干预,它能有效改善不利处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并促进他们心理适应。

参 考 文 献

- 1 段成荣,马学阳.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人口与经济,2011,4:16-22
- 2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江苏纺织,2010,8:8-11
- 3 林丹华,马丽霞,徐晓,叶楠,等.年轻女性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2):183-186
- 4 周莹.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

—基于W市调查案例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9,3:54-58

- 5 杨卓耸,耿明峰,段志慧,等.青年农民工心理障碍的成因、调查和预防.中国市场,2012,5:86-90
- 6 章洵.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社会工作,2007,5:48-51
- 7 张居永.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调查与思考.岭南学刊,2012,1:103-107
- 8 胡伟,王芳,马丽霞,林丹华.歧视知觉、逆境评价和流动人口心理适应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5):679-683
- 9 Tiffany Y, Gibert CG, David TT.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 impact of ethnic identity and age among immigrant and united states-born Asian Adults. Development Psychology, 2008, 44(3): 781-800
- 10 刘素珍,张丽.社区部分“问题家庭”家庭环境质量测评及相关研究.心理科学,2008,31(5):1147-1149
- 11 涂翠平,方晓义,刘钊.家庭环境类型与青少年亲子冲突解决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2008,6(3):187-191
- 12 饶燕婷,张红霞,李晓铭.家庭环境与大学生抑郁和疏离感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1:70-76
- 13 Linda PL, Alivi AA. Discrimination and adjustment among Chin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Family conflict and family cohesion as vulnerability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Psychology, 2010, 100(12): 2403-2409
- 14 陈晓菁.家庭关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 15 周林波.统筹城乡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 16 Richard D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impact of social stigma.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141(2): 174-189
- 1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34-142
- 18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79-80
- 19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200-202
- 20 Vemla McM, Brown PB, Gene HB, et al.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a moderator of the links among stress, maternal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1, 63: 915-926
- 21 杜常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论文,2010
- 22 Tomoko T, Jiro T, Takaya K, et al.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on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97, 39(1): 12-24

(收稿日期:2013-03-21)